



华夏文摘增刊
文革博物馆通讯（三八〇）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五四六期 ——
(二〇〇六年十二月二十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0612f)

【艰难岁月】艰难岁月的再回首——读《吴法宪回忆录》(上)	丁凯文
【当事者说】“九一三”事件中林彪专机机组人员的走与留	康庭梓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艰难岁月】

艰难岁月的再回首
——读《吴法宪回忆录》(上)

• 丁凯文 •

吴法宪将军去世已有两年多，今天我们终于看到这部期盼已久的《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上下册)。很早就听说吴将军身后留下了一部回忆录的书稿，记述了他自己人生几十年的经历，特别是文化大革命这段历史时期的风风雨雨的历程。笔者之所以特别关注此书的问世，盖因这是被中共打倒的所谓“林彪反革命集团”中主要人物首次公开发表的回忆录。以往的三十多年里，相关的信息和资料被封锁之严，实为前所未有的，即便有一些披露，也多为政治说教，少有可称得上历史科学认可的材料。我们听惯了也看惯了官方就“文革”史和“林彪事件”的一家之言，几十年来官方的说辞充斥着各种媒体，不少书籍和刊物也是东抄西抄、人云亦云，前后不一，矛盾百出，致使历史的真相被掩盖、搅浑，甚至被歪曲，但我们却从未知悉当年这些身在其中、经历其事的另一方的主要当事人是如何叙述这段历史的，他们讲述的亲身经历对解开那段历史之谜无疑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今天我们有幸阅读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军委办事组副组长兼空军司令吴法宪将军的回忆，对澄清那段历史有着不同寻常的重要意义。笔者愿将读书后的一些心得逐一写出。当然本人主要是围绕吴著的下册而写。所谓心得也就是一孔之见，未必得当，望读者不吝赐教。

一、庐山会议与批判彭德怀

吴将军的回忆录下卷开头是“文革的前奏”，从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说起。1959年的庐山会议是毛泽东在党内发起的一次维护个人权威、打击压制党内不同意见的运动，它以打倒所谓的“彭黄张周”反党集团为代价，成功地阻止了党内对毛泽东自发动大跃进运动以来种种严重错误和倒行逆施的批评、批判，也正是由于这次党内斗争，毛泽东和中共的左倾政策和路线更加变本加厉，泥足深陷不能自拔。庐山会议进行之时吴法宪并未与会，而是和空军副司令王秉璋赴大连疗养，但是吴随后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揭发批判彭德怀、黄克诚，有些内容尤其值得我们注意、思考。

据吴的回忆，庐山会议还未结束时，空军司令刘亚楼给吴打了电话，异常兴奋地告诉了吴会议的一些情况，特别是毛泽东决定由林彪取代彭德怀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刘亚楼为何对此如此高兴？吴认为这主要与彭德怀和刘亚楼之间关系紧张有关，彭主持军委工作时对刘亚楼和空军系统有看法，并常持批评态度。吴举例说，空军内部丢失了一个笔记本，记载了空军后勤部门一部分的“五年计划”，彭德怀大为不满，多次指责批评空军领导，一次还骂到吴的头上，彭不仅指责空军，连负责公安的罗瑞卿也一起骂了，甚至将状一直告到毛泽东处。如果仅仅丢失了一个笔记本何至于彭德怀如此兴师动众地抓住不放呢？吴认为，这是由于历史上彭领导的红三军团与林彪领导的红一军团曾经发生矛盾所致，特别是对当时罗瑞卿、刘亚楼这几个红一军团的主要骨干和代表人物不满，以致日后彭德怀借题发挥，在彭主持军委工作时对罗刘等人常持批评态度。

罗刘对彭之态度与对林的态度则决然相反，罗刘在历史上都是林彪的老部下，都是红一军团的主要干部，在艰苦的战争年代就形成了坚定的友谊，林对罗刘二人都大胆使用，充分信任，他们三人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中共建国之后，林罗刘三人虽不在一起工作了，但还是经常见面，关系如故。这种在战争年代沿袭下来的友情与关系自然异常稳固。林彪上台主持军委工作，提议罗瑞卿出任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主持军委办公会议，成为军队的关键重要实权人物，实乃顺理成章也，罗刘对林的上台当然高兴。

据吴的回忆，军委扩大会议批判彭黄，也是采取人人发言，个个揭发的方式，刘少奇、陈毅、林彪等相继发表讲话，刘少奇给彭定调为“右倾机会主义”，彭有野心要夺权。然后分组批判彭黄二人。吴对黄克诚的揭发，只有一条对黄颇有伤害。吴认为黄有本位主义，原来黄在新四军三师工作时，曾有一些剩余的黄金，后来黄走到哪里就带到哪里，从东北到天津，后又带到湖南。吴的本意是，黄应将这些黄金上交给上级部门，而不应一直带到湖南。然而，这一“揭发”日后却成了黄贪污的证据，令黄痛苦不已，实也违背了吴的本意。吴在回忆录中再次表示了自己的歉意。

会议开了几天后，罗瑞卿来到黄克诚组，厉声责问黄为何造谣说长征途中罗杀了红三军团的人，黄说是钟伟所言，钟伟时任北京军区参谋长，钟伟为黄作证的确是罗下令将红军中掉队走不动的人打死。吴法宪自己也知道此事，但是当时只有钟伟一人不避个人前途之安危出面为黄克诚作证。在这种形势下，吴也不得不“揭发”黄的问题，此后吴还参加了军委批斗邓华、洪学智的会议，吴本人却没有再揭发此二人的问题。显而易见，罗瑞卿在这场批判彭黄的斗争中是多么积极、卖力。这也是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

从中共党内军内斗争的情景来看，所谓揭发的问题大多是牵强附会，欲加之罪，只要“上面”将某人划为“反党集团”，别人就不得不群起而攻之，墙倒众人推，人们只有揭发批判得越狠，越能表现出对党和对毛的忠诚。吴法宪自己感叹说：“从这么多年的党内斗争历史来看，斗人的和挨斗的，不过是一种角色的转换，今天斗人的人，明天也可以变成挨斗的。十年动乱年代更是如此！”真是妙哉斯言，善哉斯言。

二、七千人大会与林彪的讲话

1962年初中共召开了一次中央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人来自中央、中央各部委、各省市自治区、各地委、县委等负责干部，达七千人之多，故称之为“七千人大会”，这也是中共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次超大规模的中央工作会议。这次会议的目的是要针对建国以来，特别是大跃进以来出现的问题加以总结，以便清理左的错误，统一全党认识，进一步落实“巩固、充实、调整、提高”的政策。显然，这次会议即使不是明确针对毛泽东而来，至少也要针对毛泽东的极左路线和政策，扭转这些人为造成的极左局面。显然这次大会的主基调就不符合毛泽东的意图，而刘少奇带领一班人搞出来的报告更让毛泽东如坐针毡，由此，毛泽东开始表态反击，不仅认为该报告只看到现象，没有分析，更要重新起草报告，当场给刘少奇等人一个难堪。

林彪在1月29日发表了一个讲话，对毛泽东大肆吹捧，林彪的讲话深得毛泽东的赞赏。林彪这个讲话长期以来被人们所诟病，指其为无原则的替毛解围，实乃为虎作伥。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此事，林彪的讲话当然不是一个负责任的政治家的正确所为。可是人们往往忽略了一个背景，即林彪为什么会在这种场合发表这样一通讲话，林彪的真实想法又是什么？吴法宪的回忆给了我们一个可信的答案。

军队作为一个整体虽然有相当一批代表参加了这次大会，但是军队代表们的看法与地方干部就大跃进以来出现的问题有明显的区别。一来军队讲究纪律，下级绝对服从上级，没有上级领导的指示，军队代表通常是不会主动发言的。其次，军队的主要领导人，包括林彪和几个老帅们以及罗瑞卿、萧华、谭政、刘亚楼等人都对军队的干部们打了招呼，要求大家不要乱发言。军队并未卷进地方的工作，大跃进、大炼钢铁都没有军方的事，所以也不存在“出气”的问题。再次，军队的一些主要领导人都希望林彪出面讲讲话，其中不仅有老帅们还有陶铸、罗瑞卿、刘亚楼等人。吴回忆说：“林彪起初很犹豫，不愿意出来讲话。最后包括军委的一些领导，也都来怂恿林彪出来讲话。他们都说，现在别人出来讲话都不适当，只有林彪最具备这个条件。他们的理由是：从历史关系上看，林彪是一向拥护毛泽东的；庐山会议以后，林彪又接替彭德怀主持了军委日常工作，是中央副主席和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在党内、军内威望很高。所以，不论是地位，还是威望，或是时机，只有林彪这时候出来讲话最适合。否则就难以缓和形势，维护局面。这一说，就把林彪鼓动出来了。”这些情况都是空军司令刘亚楼告诉吴的，而当时刘亚楼与林彪的关系非常密切。林彪同意出面讲话后，刘亚楼高兴地对吴说：“林总愿意出来讲话了，我们都认为只有他出来讲话最好。”

林彪讲话的大致内容，现今大家都已知悉，此处就不赘述了。林彪的讲话和后来毛泽东的讲话成功地扭转了会议的气氛，毛泽东虽然作了轻描淡写的自我批评，但是极左思想的根子并未触动，当然更谈不上从体制的角度予以制约、预防。刘少奇后来重新搞出来的报告实际上已大大后退，但是，毛泽东与刘少奇的矛盾也由此肇始。林彪自己是怎样看待此事的呢？吴法宪回忆说：“林彪讲话后，军队的干部们都很高兴，纷纷赞扬林彪讲话讲得好。只有林彪本人不以为然，他说：‘我这样讲是出于无奈，不这样讲，毛主席的威信受到影响，这个局势就不好维持了。’”由此可见，林彪并非没有自己的见解，在当时的情况下，林彪完全清楚党内矛盾的存在，他也意识到毛泽东的失误所在，但在毛刘关系紧张和中央上层出现裂痕之际，林彪不得不在“忠君”和“党内大局”的面前选边站在了毛泽东的一侧。林彪的选择在关键时刻，在最大程度上支持了毛，毋庸说这就是林彪的局限性，同时也在历史上留下了一个抹不去的污点。

三、罗瑞卿的倒台

罗瑞卿的倒台是文革初起时一件历史公案。罗瑞卿为何倒台？其根本原因何在？一直是一

个说不尽的话题。大陆官方的一致说法是：罗瑞卿刚直不阿，对林彪的突出政治一套深恶痛绝，经常抵制林彪的错误，引发了林彪的忌恨。为了达到排挤罗瑞卿的目的，林彪借着文革发起之际，趁机倒罗，毛泽东为了得到林彪的全力支持，于是“违心地”同意林彪的意见，拿下了罗瑞卿。这一说法流行于当前的大陆史学界。

吴法宪的回忆中有如下史料值得注意：

（1）1965年秋，副总参谋长杨成武常去上海看望总政主任萧华，常顺便去苏州造访林彪，杨与林彪的来往增多。

（2）军委办公厅主任萧向荣被突然解职。杨成武兼任军委办公厅主任，林杨关系日趋密切。

（3）身为总参谋长的罗瑞卿工作繁忙，经常外出，与林彪的关系逐渐疏远，有些事也自己作主，未向林彪报告，如搞“全军大比武”等。

（4）1965年11月末的一天，叶群致电吴法宪，要求吴派空军飞机将叶从苏州送去杭州，并嘱吴要严格保密。事后叶群告吴此行是向毛泽东汇报罗瑞卿的问题。

（5）12月7日军委副主席叶剑英通知吴去上海开会，并将北京的一些主要领导人送去上海。但叶剑英未向吴透露会议的内容。

（6）吴法宪一到上海，杨成武和萧华就与吴谈话，随后叶群向吴透露此次会议乃毛泽东所决定，要解决罗瑞卿问题。叶群还透露，林彪对如何处理罗瑞卿一事没有表示任何意见，然毛泽东决定先搞背靠背地批判罗瑞卿。叶群还向吴提供一些揭发材料，如罗反对突出政治，对林搞封锁，逼林交权等。

（7）上海会议分为三个组，分别由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主持，吴被分在邓组。由于组内发言冷清，邓点名让吴发言，吴不得不将叶群提供的材料照本宣科说了一遍。与邓组的冷清相比较，杨成武、萧华、叶群所在的组则异常活跃。叶群在会上抛出了一个材料，即罗瑞卿曾要刘亚楼转告叶群“四条意见”：“第一、林总早晚都是要出中央政治舞台的，现在不出，将来也要出；第二、要保护好林总的身体；第三、林总不要再干涉军队的工作了；第四、要放手让罗瑞卿工作，军委的事情交罗瑞卿就可以了。”

（8）周恩来在会议第三天命令吴法宪派专机去昆明接罗瑞卿到上海，周还特别交代要吴亲自掌握好飞机“作好应变措施，飞机只准往东飞，不准往西飞”。吴说“我明白他这话的意思，就是要防止罗瑞卿跑到缅甸或印度去。”

（9）1966年3月，毛泽东决定在北京继续开会，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和杨成武、萧华组成领导小组，负责主持会议，领导与罗瑞卿进行面对面的斗争。此时，叶群曾多次打电话给吴，要求吴在会上揭发罗瑞卿，特别是叶群在上海就已提出的“四条意见”。吴说“叶群当时打的是林彪的旗号，他们又远在苏州，我无法也不敢去林彪那里辨别真伪。‘一定要在会议上发言’的这个指示，是确实来自林彪，还是叶群假传圣旨，我真的闹不清楚，而且至今也不清楚。”吴不愿就此事发言，但杨成武则说，“你不讲，怎么向林总交代。”因此，在压力下吴法宪还是在会上作了发言。

（10）吴法宪最后总结说：“罗瑞卿是党内高级干部中在‘文革’前后被打倒的第一人。单就这件事而言，罗瑞卿的下台，提出问题的是林彪，但下决心的却是毛泽东。批示罗瑞卿是折中

主义的是毛泽东，决定召开上海会议并亲自坐镇的是毛泽东，要邓小平在北京召集会议继续批判罗瑞卿的是毛泽东，决定撤销罗瑞卿的军职，并分别由叶剑英、杨成武继任的，也是毛泽东。至于毛泽东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不知道。”

根据以上吴法宪所披露的情况来看，笔者有如下一些感觉：

（1）林彪与罗瑞卿之间存在着一些矛盾，但是从吴法宪的回忆来看，这种矛盾似乎并未尖锐到林彪非要整倒罗瑞卿，至少吴法宪本人并未有所察觉，与此同时，林罗关系的冷淡更显出杨成武与林关系的热络。

（2）毛泽东在上海召开倒罗会议，完全是有备而来。虽然吴法宪自己在会前未必知晓开会的内容，但是从叶剑英和杨成武等人的积极活动来看，他们对此都心知肚明，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何这些人在倒罗一事上这么积极。

（3）无论在上海会议上还是北京会议上，林彪都没有发过任何指示，也未作过任何的表态。这一态度耐人寻味。

（4）叶群在这次倒罗事件中的确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但是叶群去杭州向毛泽东汇报罗瑞卿的问题，是叶群（林彪指使？）主动要去汇报，还是毛泽东主动让叶群去杭州汇报并听取军内各大佬的意见，以便决定对罗采取什么措施？叶群与军内大佬叶剑英、杨成武、萧华等人相比，谁的能量更大？谁起得作用更大？

（5）以吴法宪当初在党内和军内的地位，吴法宪在批罗倒罗一事上起的作用十分有限。说句实话，那时的吴法宪还不够资格，军内倒罗的势力还轮不到吴法宪冲锋陷阵。许多内情吴法宪未必知悉，当然更谈不上参与决策。所以吴法宪只是知道其中一部分内情，而非全部。

吴法宪在回忆录中谈了毛泽东的这场倒罗斗争，但是笔者读后还有些地方不甚满足，有些问题尚需今后继续予以分析和探讨：

（1）回忆录中对叶剑英、杨成武等人的表演着墨太少，大量的事实证明，这些人才是毛泽东倒罗的急先锋！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批转了《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错误问题的报告》，这份报告说“为了教育干部，吸取教训，并肃清罗瑞卿错误影响，中央决定将中央工作小组的报告和中央批语发到县委和团级党委，这个报告所附的叶剑英、谢富治、肖华、杨成武等同志的四个主要发言，罗瑞卿三月十二日的检查以及叶剑英、肖华、杨成武、刘志坚同志四月二十四日向主席、中央的报告，发给地委和师级党委，口头传达到县、团级党员干部。”由此可见，最主要的几位倒罗大员就是叶剑英、谢富治、肖华、杨成武和刘志坚等人。这份报告给罗瑞卿定的罪名有“第一、敌视和反对毛泽东思想，诽谤和攻击毛泽东同志。第二、推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对毛主席军事路线，擅自决定三军大比武，反对突出政治。第三、目无组织纪律，个人专断，搞独立王国，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第四、品质恶劣，投机取巧，坚持剥削阶级立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登峰造极。第五、公开向党伸手，逼迫林彪同志‘让贤’让权，进行篡军反党的阴谋活动。”杨成武还在中央工作小组专门会议上作了长篇的书面发言批判罗瑞卿，其中就有“四条意见”，杨成武说：“一九六五年二月十四、五日，罗瑞卿要刘亚楼同志向叶群同志讲了四条意见，希望劝林彪同志接受。这四条是：1）一个人早晚要出政治舞台，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不出也要出，林总将来也要出政治舞台的；2）要好好保护林总身体，这一点就靠你们了；3）今后林总再不要多管军队的事情了，由他们去管好了，军队什么都有了，主要是落实问题，不要再去管了；4）一切交给罗去管，对他多尊重，要放手让他去管。刘亚楼同志并对叶群同志讲，‘罗总长说只要你办好了这件事，罗总长是决不会亏待你的。’”正

是由于叶剑英、杨成武等人的积极参与倒罗斗争，事后他们瓜分了罗瑞卿在军内的职务，叶剑英出任军委秘书长，杨成武出任代总参谋长。

（2）罗瑞卿与老师们的矛盾基本没有涉及。如果不能将这些史实澄清，就无法解释为何一班老师们都支持毛泽东整罗，其中最积极者有叶剑英、聂荣臻等人。这些人在事件之初到底起了什么重要和关键的作用？

（3）林彪在倒罗一事上的真实态度。提名罗瑞卿出任军委秘书长和总参谋长的正是林彪本人，罗瑞卿与老师们有矛盾之时，林也曾多次提醒罗要予以重视。林彪在1965年11月30日给毛泽东的信中开头特别提及“好几个重要的负责同志早就提议我向你报告。”，这句话很关键。好几个重要的负责同志都是谁？他们要林彪向毛泽东报告什么事？现在有资料说，所谓“重要的负责同志”就是叶剑英、聂荣臻等人。是林彪主动向毛泽东提出罗瑞卿的问题，还是罗瑞卿的问题严重到林彪不得不向毛提出？这几位“重要的负责同志”是如何向林彪传达的毛泽东的旨意？联系到毛泽东搞文革打倒刘少奇这个整体战略部署，倒罗难道不是毛倒刘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所谓的林彪与罗瑞卿的矛盾难道不是也被毛泽东所利用作为倒罗的一个借口？

从历史的角度，用实事求是的态度来看：罗有没有错误？如果没有，就是毛林对罗的诬陷，就是共产党中央对罗的诬陷。上面林给毛主席的信中说“好几个重要的负责同志早就提议我向你报告”，也就意味着“好几个重要的负责同志”对罗诬陷，向毛林告罗瑞卿的“黑状”。如果罗有错误，对罗能不能批评？批评是不是就必须打倒？批评是不是就等于打倒？我们都知道了林曾经对罗有过的批评，但至今尚未听到，在对罗做组织处理（打倒）问题上，林表过什么的态度；迄今也没有见到林要求毛、希望毛打倒罗的史料。但毛亲自主持召开的上海政治局扩大会议则是毛要解决罗的问题。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是林要打倒罗还是毛要打倒罗？林要打倒罗对林并没有什么好处，一是反过来证明林当初选总参谋长就选错了，二是得罪了几十年革命情谊的老战友、老部下，三是要找罗这样有能力有魄力有资格（大将）的总参谋长难。可毛要打倒罗，就把与刘、邓、贺日益贴近握着军权的罗踢开了，军权又重新握在毛手上了，搞文革就更放心了，倒刘就更有把握了。毛在文革中多次说过：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的重要标志是打倒了“彭罗陆杨”。“彭罗陆杨”是连在一起的，毛是作通盘考虑的，“彭罗陆杨”就是刘邓司令部的前沿阵地。另一个问题是，在林给毛写信之前，其他老同志向毛反映罗的问题没有？是林给毛写信在前，还是毛找叶剑英等人谈话在前，只要排排时间，问题是谁提出的，是谁对罗发的难，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林在信中说的老同志，是谁，地位肯定是高于罗的，或者是当时在军中有实权的。那么，他们是认为罗有错误才到林处去告状，还是到林处去对罗栽赃？！这些人向林反映罗的情况时，向毛反映了没有？罗的问题林早有发现，并对他进行过严肃的批评，但林并没有对外张扬，批评罗的用意在关心他，甚至林对“四条”都守口如瓶。如林张扬了，这些“重要的负责同志”也没必要再去向林嚼舌。林对罗的态度已经显而易见了。林是个很沉的住气的人，林不得已给毛写信，并在毛召叶群时同意向毛反映罗的情况，这为过吗？！再不反映林可能就被装进去了。

所以，以上的问题还需再作仔细认真的研究和分析。吴法宪的回忆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材料。

四、空军党委第十一次全会

1966年6月到9月，解放军空军党委召开了第十一次全会，这次会议是在文革刚刚兴起之际召开的，但是却已深深地打上了文革的烙印，它在空军历史上有着相当重要的作用。然而目前学术界对此次会议的情况研究甚少，很多书籍对此也语焉不详，此次事件的另一个主角——空军副司令刘震上将的简历也回避了这一事件，只是采取了流行的说法：“刘震在文革期间

受到林彪、江青的迫害”云云。空军这次党委会为何会召开？会议为何持续这么长时间？其背后的真正原因又是什么？卷进此次斗争的空军上层领导们是如何发难的？事后军委领导们又是如何平息这场斗争？空军这次斗争对日后贺龙等人的倒台又起了什么作用等等？这些都是人们需要予以认真分析研究的。

1966年4月下旬吴法宪与空军副司令成钧赴西北地区执行氢弹投掷任务，完成任务后随即赴西北地区的航校、高炮、导弹和飞行部队检查工作。5月底接空军政委余立金电话要求吴迅速返京，甚至告诉吴，叶群要余转告吴再不回京就会变成“恩克鲁玛”。恩克鲁玛乃西非加纳的总统，因为外出访问，国内发生军事政变，结果成了流亡总统。吴回京后于6月4日召集空军党委会，但是却遭到空军其他几位副司令的责难，主要有刘震、曹里怀、王辉球等人，连成钧也加入倒吴的行列。这几人给吴戴上了几顶大帽子，如“消极对抗《五一六通知》，不组织学习、讨论，不抓‘文化大革命’”等等，在刘震等人的要求下，空军决定召开空军党委全体会议。6月6日会议正式开始，刘震等人展开了对吴法宪的批判，同时要求军委派工作组。吴法宪回忆说“从一开始，参加空军党委十一次全会的人就形成了三派。这里面，我和余立金，以及军区空军和空军领导机关的一部分人是一派，我们这派人是天天受气。刘震、成钧、曹里怀、余深吉、常乾坤、谭家述、王辉球等几个常委以及军区空军的另一部分人是另一派，他们是天天出气。张廷发是孤立的，他一个人一派，两边都不靠。”批吴会议一个多月后，刘震等人联名向中央军委递交控告信，罗列了二十五条意见，基本上是冲着吴法宪和已去世的刘亚楼而来，大有不将吴拉下马决不甘休之意。

对于空军内部刘震等人倒吴一事，中央军委领导却不以为然，其中以叶剑英的态度最明朗。空军开会之初，叶剑英就派自己的秘书天天与会，了解具体情况，并给吴打气，要吴沉住气，并认为刘震等人的活动属于“罢官夺权的地下活动”。叶剑英与林彪也经常通气。7月下旬林彪的意见转到中共中央最高层，刘少奇为此召开中央常委会，通过了林彪的意见，刘少奇、邓小平等人明确表态，认为刘震等人是搞地下活动，搞罢官夺权。随后中央军委召开常委会，叶剑英、聂荣臻、贺龙、徐向前到会，传达了中央常委会的指示，批评了刘震等人。吴法宪在叶剑英的指示下作了长篇检查。林彪也给吴打了电话，要求吴作好空军内部的团结工作，对刘震等人的批评也要适可而止。最后刘震和张廷发被停职作检查。

刘震等人为何在文革初起时就迫不及待地空军内部掀起了倒吴运动？吴法宪认为有两条原因。一是对吴法宪接替去世的刘亚楼出任空军司令不满，刘震为中央候补委员，上将军衔，而吴只是中将，也不是中央候补委员，刘震对此心有不服；二是刘震等人对刘亚楼不满，刘亚楼任空军司令时作风硬朗，颇有些“霸道”的味道，有时也不讲情面。刘震等人对刘亚楼的怨气转向了吴法宪。但是仅仅这么两条原因就足以构成刘震等人的倒吴运动吗？其背后难道没有更深远的原因吗？吴的回忆对此有所涉及。成钧等原红二方面军的干部曾向军委副主席贺龙汇报空军党委会议情况，说“空军的问题很多，吴法宪已经不能主持会议了”，而贺龙则说“这个会，吴法宪、余立金他们不能开，你们就组织起来继续开嘛。有话就说，有问题就揭嘛。”由此看来贺龙对空军党委的倒吴行为采取了默许和纵容的态度。成钧等人后来也写了材料，由吴法宪和余立金送交林彪。吴余二人在送交这些材料时附有一信致毛泽东和林彪，信中认为空军的会议贯穿了两条路线，一是林副主席为首的红线，另一条则是贺龙为首的黑线。

现在回首再看空军党委会议发生的斗争，当初刘震等人向吴法宪发难，给吴戴的帽子并非实事求是，所谓吴法宪“不抓‘文化大革命’”等错误也仅仅是个借口，将吴一举打倒才是他们的真实目的，刘震等人以为空军党委内部他们占了多数，就可以实现其夺权的计划。但是空军党委上面还有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即使上面有个别领导人支持，如贺龙，但是贺龙一人也不能起决定性的作用。中央军委的实际当家人是林彪和叶剑英，再上面还有毛泽东呢。林彪、叶剑英对军队持非常谨慎的态度，一直要求军队不要介入地方的文革运动，要保持军队的稳定，

他们绝不会允许军队内部出现夺权事件的发生。刘震等人明着是夺吴法宪的权，但实际的结果和作用却是夺林彪的权。这些人敢于对吴发难，如果没有背景是很难解释其个中之因由的。但是说“空军的会议贯穿了两条路线，一是林副主席为首的红线，另一条则是贺龙为首的黑线”似也有上纲上线和夸大之虞，这也许就是后来贺龙倒台的原因之一吧。

发生在1966年空军的这次激烈斗争，显然不是一件什么光彩之事，以致后来即使吴法宪倒台被打成“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之一，刘震等人都不好意思将当年的这段“反吴”经历拿出来谈，毕竟刘震的这段历史并非代表了正确的一方，更何况还有叶剑英在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关于空军副司令张廷发在这次事件后也被解职一事，笔者觉得吴的回忆似乎揭示得还不够充分，张廷发本人并未参与刘震等人的倒吴活动，可后来也被一并解职，其错误仅仅是“蛮横和目空一切，对空军的一些老同志很不尊重，并且与司令部一些同志的关系也搞得很僵。”这里是否还有其他因素存在？人们还需要作更深入的分析探讨。

五、周恩来在文革中的若干活动

文革当中周恩来所起的作用，一直是个引人关注的话题。海外有高文谦的《晚年周恩来》，国内则有刘武生的《周恩来的晚年岁月》。周恩来在国内一直是个正面形象，对于周恩来在文革当中的活动，国内史学界大都认为周恩来以各种方式抵制了文革错误路线，与林彪和江青集团作了坚持不懈的斗争，周恩来在文革时期不得不说了一些“违心的话”“做了违心的事”云云。然而，事实真是如此吗？吴法宪以其亲身经历提供给我们许多事例，有助于人们进一步深入研究和探讨周恩来在文革当中所起的实际作用。

（1） 周恩来推荐林彪接替刘少奇在党内的职务。周恩来在1967年秋天告诉吴法宪，在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矛头对准刘少奇。毛泽东问周恩来“看来刘少奇不行了，我对他观察了二十一年，完全失望了。对邓小平也观察了七年，也失望了。要把刘少奇拿下来，现在怎么办？”，周恩来回答说“那就只有林彪了，由林彪代替刘少奇最合适。”毛说“好，那就把林彪接来北京吧。”1966年8月7日晚吴法宪接到周恩来电话指示，第二天上午派专机去大连接林彪回京。周还特别交代说“要绝对保密。这件事，只准你一个人知道，不能告诉任何人。”当接林彪的专机抵达机场飞机滑行到机场在跑道一头停下时，周恩来立即登机面见林彪，汪东兴代表毛泽东也赶到机场，周汪二人向林彪传达了毛泽东的旨意。（此处吴的回忆有误，据《毛泽东传》，林彪是8月6日被专机从大连接回北京的。）

（2） 1966年8月8日周恩来亲自向军队主要领导人打招呼，传达毛泽东的“大字报”精神。与会者除吴法宪外，还有杨成武、张爱萍、萧华、许光达、肖劲光、苏振华等人。周恩来将毛的“大字报”向众人连续念了两遍，并说“现在看来，多年的事实证明，刘少奇不行了，他不能再主持中央的工作了。主席原来想培养刘少奇当接班人，现在看来不行了，他辜负了毛主席的希望。现在中央决定，把林彪同志接回北京接替刘少奇，担任中央第一副主席。现在先通知你们一下，暂时不要再往下传，就你们知道就行了。”

（3） 周恩来对中央文革小组的大力支持。1966年10月中央召开中央工作会议，重点批判刘少奇的错误路线。但是由于与会的各地干部对所谓的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所以对于批判刘少奇并不积极，会议开了许多天却效果不彰。经文革小组提议，周恩来亲自给吴法宪下令，由空军派出专机，将各地的造反派头头们接来北京，一起参加讨伐刘少奇的大会。这些造反派头头一到北京，就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批刘斗争。吴法宪回忆说“我们东北组来的是贵州

造反派头头，此人一到北京就由中央办公厅派专车接到京西宾馆，神气十足。他来了以后，周恩来亲自到东北组来参加会议，以示重视。他滔滔不绝地一直讲了三个钟头，专门揭发当时贵州省委第一书记周正林等人是如何破坏‘文化大革命’，如何镇压学生运动和逮捕红卫兵的情况。我看到，在这个人讲话过程中，周恩来一直在频频点头，赞扬他的揭发。”造反派的与会终于在会上掀起了批刘高潮。

（4）周恩来大力支持红卫兵运动。红卫兵运动是毛泽东对付党内“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的锐利武器，毛泽东靠着这批“革命小将”的敢打敢冲，迅速击溃了党内当权派的势力。1966年8月3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了红卫兵，周恩来在会上代表中央讲话，对红卫兵表示热烈支持，周说“现在，全国各地的同学到北京来交流经验，北京的同学也到全国各地去进行革命串联，我们认为，这是一种很好的事情，我们支持你们。中央决定，全国各地的大学生全部和中学生一部分代表，可以分期分批地到北京来。”吴法宪回忆说“每次接见红卫兵，周恩来都要做大量的具体组织工作。据我所知，这些工作非常繁重，也可以说是中央和北京市各部门一个额外的沉重负担。接见之前，周恩来每次都要在天安门城楼上，召集国务院、解放军各总部和各军、兵种的负责人，研究组织和安全工作，布置好警戒。我们这些跟着周恩来做具体工作的，也经常要忙上几天几夜。”由于运输系统的饱和和巨大困难，周曾请示毛泽东对串联人数加以限制，但是毛泽东却坚持搞大串联不变，周恩来不得不召集国务院、北京市和军队各部门负责人开会，全心全意“接待毛主席请来的客人”。毛泽东在西郊机场接见红卫兵，由于机场跑道不够长，周恩来亲自布置，军队连夜施工，临时扩展机场跑道，两侧各延伸250米，并筑路修桥，以便大队人马顺利通过。毛泽东接见完后，由于散场时过于拥挤，有几十人被挤伤，周恩来立即命令吴法宪将这些送到空军和海军的医院，周恩来还亲率吴法宪等人前往慰问。红卫兵大串联到了井冈山，由于山上没有足够的粮食，学生出现断食现象，周恩来紧急动员武汉、南昌、广州、福州、杭州等人群众蒸馒头，做面包、饼干和点心，命吴法宪派空军飞机向井冈山空投食品，前后持续了半个多月，才使大多数学生免于饿死。

（5）周恩来对林彪的大力支持。8月31日毛泽东接见红卫兵时周恩来亲自安排了检阅车辆，毛泽东与贺龙为第一车，林彪是乘第二辆车。但这次检阅的照片要登报时却出现了问题，即如何在报上予以说明，最后周恩来发明了林彪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一词，以突出林彪的地位。“亲密战友”一词也由此传开，为报刊广播广为使用。吴法宪回忆说“在当时的中央文革碰头会上，我听到周恩来不论是会上讲话，还是在会下打电话，对林彪都是统称‘副帅’，经常说副帅如何如何。最后，这称呼成了他的口头禅，不称‘林彪同志’，只说‘副帅’。”周恩来与林彪之间的关系在文革期间也是十分密切的。

以上这些内容仅仅是吴法宪回忆中的一小部分，周恩来在文革期间实际上还作了其他大量的工作。证诸这些史实的目的在于说明，周恩来在文革中绝不是“抵制”和“反对”了文革运动，相反，周恩来是积极参与和大力支持文革的，没有周恩来所起的关键作用，文革运动很难这么声势浩大、如火如荼地展开。我们也实在看不出周恩来是如何与“林彪、江青集团作坚持不懈的斗争”的，周恩来积极配合了中央文革小组，起了江青等人起不到的作用。周恩来也绝非“说了违心话，做了违心事”这么简单，这一说法无非就是为周恩来的文革所为作开脱。用一句形象的话来说，周恩来是毛泽东大搞文革运动的“总参谋长”，是保障文革顺利进行的“总后勤部长”。

六、林彪与军队文革之关系

长期以来林彪的形象一直被官方所丑化，似乎林彪利用了毛泽东的错误蓄意搞乱全国全军，以达到其篡党夺权的目的。这种观点也是国内史学界最为流行的说辞。然而历史真是这样吗？吴法宪在其回忆中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可信的资料，有助人们进一步厘清这段历史，还原历史的

本来面目。

吴法宪回忆说“在军队怎样搞‘文化革命’的问题上，林彪与中央文革以至毛泽东之间，曾经有过不少矛盾和冲突。”“作为主管军队工作的军委第一副主席兼国防部长，至少在两个问题上，林彪的态度是比较明朗的：一个是希望军队能相对地稳定下来，至少不要像地方那样搞得一团糟，否则如果敌人乘机入侵，就无法履行保卫祖国的职责，也无法向党中央和全国人民交代；另一个就是不希望军队介入地方的‘文化大革命’，认为地方的事，应该让地方自己去搞。”面对风起云涌的文革风潮，林彪作为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第一副主席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1）林彪对军队院校师生进京接受毛泽东接见作了三条规定：第一、军队院校师生可以分期分批来京接受毛泽东检阅，但检阅后必须立即返回原单位；第二、来京后要一切行动听指挥，要有组织地来并由领导带队；第三，来京后由军队负责接待，不准到外面去串联。林彪还于1966年10月上旬授意全军文革起草了《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这个紧急指示实际上也是被毛泽东和整个形势逼出来的，该指示虽然也说军队院校的文革运动要与地方一样，按照十六条规定办，但该指示还说“为了搞好军队院校的斗批改，应当允许进行革命串联和调查，但军队院校不要干涉、介入地方的文化大革命。”尽量对军队院校师生的文革活动予以限制。

（2）林彪对文革的学生运动群众运动采取了最大程度的克制态度。由于军队院校的不少学员在中央文革小组的鼓动下冲击国防部，总参、总政、国防科委等机构，号称要揪出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副总参谋长李天佑。总政主任萧华等请示叶剑英后，打算严肃处理，对于闹事的头头还要抓捕。但是林彪没有接受这些建议，而是提出“四不政策”，即对这些学员们“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不抓人，不开枪”，做好这些人的思想工作。因为稍有不慎，就会酿成事故甚至悲剧，林彪宁可采取克制政策。

（3）利用开军委扩大会议之机保护军队的干部。1967年1月上旬，中央军委在北京的京西宾馆召开军委扩大会议，林彪的本意是借开会的名义把军队的主要领导人接来北京予以保护。林彪还规定，不经过林彪、叶剑英和徐向前三人的批准，任何人不得返回原单位，另外林彪也想让与会者集思广益商讨对策，以稳定军队，尽量减少运动给军队带来的损失。林彪委托叶剑英主持会议，叶剑英每天都向林彪作汇报，周恩来也常来与会。会议首先制定的就是《中共中央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通知说“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得冲击人民解放军的机关。”第二个文件就是著名的“军委八条命令”，这是林彪口授，并争得其他几位老帅得同意后，报毛泽东批准执行。对稳定军队起了重要作用。第三个文件就是《中央军委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得几项规定》，军以上机关的运动必须在党委领导下进行，军队领导机关不宜成立各种“文化革命战斗组织”，一律不许自下而上夺权。军以下机关则坚持正面教育，一律不得进行“四大”。此外，会议还制定了其他文件，如《关于军以上机关进行文化革命的补充规定》、《关于军队夺权范围的规定》、《关于外出人员串联限期返回本单位的通知》、《关于重申切实执行军委二月八日决定的通知》等等，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这些文件都是叶剑英向林彪汇报，并由林彪与周恩来共同领导制定，很好地体现了林彪力求稳定军队、尽量减少“文革”对军队的冲击的指导思想。

正是由于林彪和军委其他老师们的共同努力，军队的局势得到控制，稳定的军队后来通过“三支两军”稳定了全国的局势。总的说来，军队在如此复杂的环境下做了大量的工作，既保护了一批老干部。也使社会秩序趋于稳定，同时也减少了人民生命和财产的损失。稳定的局面使原本中断的工农业生产得以逐步恢复，使全国的交通、金融、建设等各项工作得以正常运行。事实上军队系统正是日后粉碎“四人帮”的坚强柱石。

吴法宪总结说：“林彪倒台后，有些文章说：林彪是个反军、乱军分子。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利用手中窃取的权力，煽动在军队搞全面‘四大’，拼命想把军队搞乱，等等。这个说法显然极不客观，也是极不负责任的。林彪是军委的主要领导人，他为什么要一心把自己搞乱？这个说法于理不通，也绝不符合事实。大量事实已经证明，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自始至终都在注意保持军队的稳定，甚至不惜与以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发生激烈的冲突。”

仅就稳定军队这一点而言，林彪功不可没！

七、林彪与江青的矛盾

林彪与江青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长期以来都是大陆官方的一家之言，也就是说，林江是一伙的，乃狼狈为奸，他们共同利用了毛泽东的错误，大搞“反革命”活动，妄图推翻人民民主专政，林江二人都属反革命集团。1980年的“两案”审判更是将林彪与江青画上了等号。但是，林彪与江青是一回事吗？只有认真分析文革当中林彪与江青的实际关系，才能真正解释为何林彪会在1970年8月的庐山会议上出面打击以江青为首的“上海帮”。对于揭示林江之关系问题，吴法宪的回忆无疑给人们提供了新的资料和视野。

吴法宪回忆说：“对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文化大革命’，不管林彪是否衷心拥护，但同周恩来一样，他都全力去执行毛泽东的部署和计划，这是毫无疑问的。至于对江青，最初因爱屋及乌，林彪对江青也是很尊敬，对江青提出的问题，也很重视。”然而，随着全面夺权运动的展开，不仅各省市地方领导受冲击，军队系统也大受影响。总参、总政、总后以及各军兵种等都受到造反派的冲击，工作停顿，不少军队领导人被揪斗被迫害。以吴法宪本人为例，吴被造反派搞得焦头烂额，为了躲避军内造反派，吴先是住到总参管理局的第五招待所，后又住进叶剑英的家，没多久又搬出来，时而住在空军指挥所，时而住西郊机场，时而住北京军区空军司令部，最后奉叶剑英之令住进中央军委直接管辖的京西宾馆，该宾馆由北京卫戍区警卫，造反派冲不进去，吴法宪的处境才略有好转。军内其他一些人则没有吴法宪这么幸运，不少人被残酷批斗，甚至死于非命，军内的东海舰队司令陶勇，国防工办副主任赵尔陆等人就是如此。林彪对江青一伙的行为极为不满，由此林彪与江青发生激烈冲突。

1967年2月，由于中央文革小组鼓动造反派揪斗总政主任萧华，引发了林彪与江青的首次冲突。吴法宪在回忆录中有专门一节谈及此事。林彪把江青找到自己的住处毛家湾，痛斥江青等人的行为。原林办秘书张云生在他的回忆《文革期间我给林彪当秘书》一书里也印证了这场林彪与江青的冲突。吴法宪回忆说“这次林彪与江青大闹，撕开的裂痕是很深的，可以说是种下了分裂的种子。林彪对江青是不满的，但是又怕得罪了毛主席，不敢过分谴责。就这样，双方的矛盾和斗争一直延续到‘九大’，延续到庐山会议，延续到‘九一三’林彪的终结。”吴法宪还说：“据我所知，在当时的中央常委以至整个的中央领导层里，敢于这样当面斥责江青的，除了毛泽东之外，就只有林彪了。”林彪与江青大吵之后的第二天，林彪通知叶剑英和徐向前主持召集军委会议，传达毛泽东对萧华问题的处理意见，并请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参加，但是中央文革小组只有关锋一人与会。会上不少军队干部争着发言，以发泄心中的愤懑。黄永胜就直言文革小组不听毛泽东的话，不执行毛泽东的指示，胡乱批评解放军，乱斗解放军干部，要夺解放军的权，希望中央文革作出认真、深刻的检讨。关锋回去后向江青汇报了会上的情况，江青大怒说这个会议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江青的会议，并将矛头对准主持会议的徐向前，徐向前只好推到会上发言的黄永胜身上，让黄永胜作检讨。为此，黄永胜去问林彪要不要写这个检讨。林彪则说“绝对不能写这个检讨，要坚决顶住。我去直接报告毛主席。”江青对林彪一点办法都没有，只好把这笔账算到徐向前的身上，并建议林彪撤换徐向前的军委文革小组组长之职。吴法宪回忆说：“林彪事后对我说：‘谁当全军文革的小组长，过不了多久，就会被打倒。如果一定

要撤换徐帅，全军文革那就让他名存实亡吧。’”吴法宪最后说，“后来果然如此，徐向前下来以后，全军文革小组组长由杨成武代理了一个短时间，不久，杨成武随毛主席东巡以后，全军文革也就销声匿迹了。”

从林彪对江青和全军文革小组的态度，即可看出，林彪是多么反感全军文革小组这一机构，这个机构的存在名义上是领导全军的文革运动，实际上则是成了江青在军内的代言人，成了搞乱军队的罪魁祸首之一，林彪当然不能容忍这种机构的存在，虽然林彪在表面上不得不应付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但骨子里却十分警惕他们，多方予以防范和抵制，乃至最后让其“寿终正寝”。如果林彪与江青的关系是密切合作，那么林彪就应该大力支持江青和全军文革小组的工作，支持他们打倒军内的老干部的种种倒行逆施。然而事实却恰恰相反，看看吴法宪的回忆，人们还能相信大陆官方的那一面之辞吗？

八、谁应该对刘少奇等人的被打倒负责？

翻开1980年11月2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查厅起诉书》，我们看到了如下的指控内容：“以林彪、江青为首的反革命集团主犯林彪、江青、康生……，在‘文化大革命’中，互相勾结，狼狈为奸，凭借其地位和权力，施展阴谋诡计，利用合法的和非法的、公开的和秘密的、文的和武的各种手段，有预谋地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篡党篡国、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该起诉书列举了受诬陷的党和国家名单：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贺龙等三十余人的名单。似乎这些人的被打倒和被诬陷都仅仅是林彪、江青等人所为。然而历史真的是如此之简单吗？

夺权斗争首先是从上海开始的。1967年1月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赫市长曹获秋被造反派打倒。吴回忆说“上海的夺权，实际上是毛泽东亲自支持和决策的。一月八日，毛泽东在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谈话中，对上海的全面夺权活动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在毛的号召下全国范围内开始了风起云涌的夺权活动。吴说“这些情况都是我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以后，江青透露给我的。”

与军队干部相比较，从中央到地方的干部几乎无一幸免地受到冲击，而这千千万万被打倒的干部中，最为著名的就是刘少奇等人。吴法宪回忆说“从一九六六年八月毛泽东发表《炮打司令部》开始，刘少奇便处于了一种”等待被彻底打倒“的状态。但是在一段时间里，他还是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参加一些公开的活动。这种不尴不尬的状态，一直持续到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从十二月十八日开始，江青、康生、张春桥、谢富治等人，开始相继公开煽动打倒刘少奇，而且口径完全一致，可以断言，这绝不是他们个人的意见。”

关于陶铸的被打倒，吴法宪回忆说“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陈伯达、康生、江青就在接见湖北省‘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时宣布，‘陶铸同志到中央来并没有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实际上是刘邓路线的忠实执行者’还说陶铸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几天之后的一月八日，毛泽东就在中央会议上认可了江青他们关于陶铸的讲话，并说‘陶铸的问题很严重，陶铸是邓小平介绍到中央来的，这个人不老实。’……毛泽东的这番话实际上是批准了打倒陶铸。”

关于彭德怀文革中的被迫害一事，吴法宪回忆说“毛泽东在（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四日召开的中央汇报会上，对彭德怀的问题作了如下的讲话：‘高岗、饶漱石、彭德怀都是搞两面手法，彭德怀与他们是勾结在一起的。彭德怀发动的百团大战，是搞了独立王国，那些事情都不和我打招呼。’有了毛泽东的指示，戚本禹就亲自布置，要北京地质学院和北京航空学院的红卫兵，去四川把彭德怀揪回北京。周恩来闻讯后，派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赶去，将彭德怀接

到卫戍区监护起来。”彭德怀被关押在北京卫戍区期间还给毛泽东写信。吴认为“从这封信的内容看来，彭德怀当时对毛泽东还寄托一线希望，但毛泽东根本没有去解救他的意思。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彭德怀在北京狱中含冤逝世。”

贺龙元帅是文革中军内被迫害致死最高级领导人之一。吴法宪回忆说“关于贺龙的问题是毛泽东亲自决定的。据我所知，一九六七年一月，毛泽东和周恩来两个人在中南海专门研究贺龙的问题。后来周恩来告诉我，那天，毛主席决定对贺龙采取隔离措施，并要他亲自去落实。他先在北京西郊的山区找了一所房子，要北京卫戍区预先作了安排。然后，他把贺龙找到中南海，先是问贺龙：‘听说你身上带了手枪？’贺龙说：‘有一支。’于是，他要贺龙立即交出身上携带的手枪。待贺龙交出手枪后，他便要警卫部队把贺龙夫妇送到北京西郊的山区。从此，贺龙夫妇便失去了自由。一九六九年八月九日，饱受折磨的贺龙在北京三〇一医院逝世。”

关于贺龙之死，过去官方的喉舌无不归结为林彪的迫害，可是为什么林彪要迫害贺龙官方却一直说不出个所以然，最后只好说贺龙是林彪篡党夺权的障碍。但是林彪在文革初期就是中共唯一的副主席兼军委第一副主席，贺龙无论如何也构不成对林彪的威胁，林彪有什么理由与贺龙过不去呢？再说，涉及贺龙这一级别的干部只有毛泽东才能决定他们的命运。显然，贺龙的倒台与林彪的关系并非如官方说的这么简单。吴法宪回忆说“至于毛泽东等人为什么要打倒贺龙，我不得而知，但当时我曾听说过几件与贺龙有关的事情。第一件事是总参王尚荣、雷英夫反对杨成武代总长的事情；第二件事是解放军政治学院蔡顺礼反对莫文骅的事情；第三件事是海军苏振华反对李作鹏的事情。再有，就是我前面提到过的空军党委第十一次全会的事情。这几件事情上，前三件我不敢妄加评论，但关于空军党委第十一次全会的事情，那完全都是属实的。”显然，那些所谓的揭发材料也并非全是空穴来风。只是这些“揭发”被专案组上纲上线，扩大成了贺龙反毛的罪证。1968年10月31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会上发表了一番讲话，也提及了贺龙的问题，毛泽东说：“过去说对贺龙是一批二保，因为他是二方面军的代表。现在看来不能保了，因为他搞的事以前不知道。从成钧、许光达、廖汉生等的揭发材料看来，他是破坏我们这个军队的。他背地搞篡军反党企图是有的，但是没有来得及。”毛泽东特别提及的揭发人不是林彪嫡系四野的人，成钧、许光达、廖汉生都是贺龙自己的亲信。毛泽东的态度最终决定了贺龙的命运，这些又岂是林彪能作的了主的？

中共后来将刘少奇等领导人被打倒被迫害的责任全都归罪到林彪头上，实乃混淆是非、颠倒黑白，为毛泽东作开脱。林彪文革中并非没有错误和责任，但是将原本不该林彪负的责任加诸在林彪身上当然是极不公正的，这是我们必须予以指出的，而吴法宪的回忆给我们提供了新的可靠的资料。

（未完待续）

~~~~~

【当事者说】

“九一三”事件中林彪专机机组人员的走与留

• 康庭梓 •

对“九一三”事件略知一二的人们都知道这样一个事实，林彪座机三叉戟256号飞机在山海关机场强行起飞的时候，机组9名人员只有4个人在飞机上，还有5名机组人员没有登机。在这一震惊中外的历史事件中，机组人员出现有死有活的局面同样令人吃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奇特的现象，同样是关心这一历史事件的人想弄清楚的问题。

## ◇ 山海关机场的“飞行后”

1971年9月12日（星期日）晚7点40分，林立果等5人登上林彪座机三叉戟256号飞机在北京西郊机场起飞，于当晚8点20分降落在距离北戴河40公里的山海关机场，准备执行当时在北戴河休养的林彪的专机任务。林立果、刘沛丰当即乘车离开机场，而后机组人员按专机任务规定，对飞机进行全面检查，这一工作飞行员们通常叫“飞行后”。虽然，256号飞机从北京起飞到山海关落地只用了35分钟的时间，飞行中也没有发现任何问题，但也要按专机任务的规定对飞机进行认真检查，大家都知道，三叉戟飞机是首次执行林彪的任务。

担任这次重要专机任务的机组人员共有9名。按机组业务岗位的划分，机长由专机部队副政委潘景寅担任，一团副参谋长陈联炳为第一副驾驶员，团通讯副主任老陈担任机组通讯员，三大队领航副主任老李担任机组领航员，机务副中队长李平担任主管机械师，机械师张延奎担任机械员，邵起良为特设师，随机空中服务员小魏，我担任机组第二副驾驶员。我当时的行政职务是三大队8中队中队长。256机组中从飞行、领航、通讯到机械各个业务岗位，都是三叉戟飞机的技术权威，在当时空军中已不可能再组成第二个同样水平的机组。

飞机发动机部分是机械师们检查的重点。空中服务员小魏留在飞机上整理客舱的清洁卫生。我在飞机后面左侧发动机处帮机械师张延奎往发动机中加添润滑油。

此刻，我看到机长潘景寅走到李平跟前，对李平说：“将飞机的油量加到17吨！”

“加17吨油！明天飞往何处？”我没等李平回答，抢在前面向机长提出反问。自北京我听到加16吨油开始，多加油的事情一直在我的脑海里回旋，好奇心使我很想知道飞机的去向。油量的多少，直接关系到航线的长短，因为我一直认为林彪像往年一样，国庆节前要回到北京参加庆典的。

“等一会儿咱们到飞机上研究一下航线。”机长所答非所问。少顷，机组除机械师、服务员外的人员，都在飞机上利用机上的灯光研究航线。

所谓“研究航线”，是机组中领航、通讯、驾驶3个主要岗位在一起进行的一项重要工作，通过航线研究，解决飞机从甲地飞往乙地全过程中的一切技术问题。

当李平把油车叫到机场，并按照规定对车内的燃油进行留样封存后准备加油时，才发现山海关油车加油导管与三叉戟飞机的压力加油接头不配套，正常加油不能进行。当李平向机长报告这一情况时，潘景寅沉思片刻后说：

“那就不要加了，等明天早上再说吧。”

机长的这个决定说明两个很重要的问题：其一，在他的心里有一个按专机任务要求的时间安排，按照这个时间要求，最起码是在第二天起飞；其二，潘不知道当天晚上紧急起飞，也就是说，潘不知道林彪等人的行动计划，否则，他无论如何也要把油加进飞机中去，而且不止17吨，会将油加满到21吨。虽然正常加油的方法不行，使用别的方法却很简单，只要爬到机翼的上边，打开油箱上盖，用油车导管直接加入即可。

按规定专机过夜停放时，必须交当地警卫部门看管，机械师李平围绕飞机再次对过夜停放应做的工作检查无误后，准备移交给山海关机场场站的保卫部门。

山海关机场是属于海军航空兵驻军基地，飞行部队及飞机已经不在，只留下负责机场警卫、通讯调度、后勤保障等场站工作人员。当晚256号飞机落地后的一切工作，几乎都是同山海关机场海军的同志们打交道的。因为是重要专机，当晚担任飞机警卫任务的都是海军排以上的干部。山海关场站为此还特意在停机坪的边上临时加装一部场内电话分机。

飞机交接完毕，当机组人员陆续步入食堂的时候，我看到从北京同机到达山海关的程洪珍与两位女兵也在食堂用餐。程洪珍身边放着一个特别精制的手提皮箱，两位女兵左肩斜背着刚才从飞机上拿下来的军用挎包。因为互不认识，谁也没有打招呼就分别坐在两张桌子上开始就餐。只是从机组进入食堂之后，那两位女兵不时向机组这边送来警惕的目光。程洪珍不足30岁，中等身材，着空军服装，面庞白净，外表看去像个知识分子，据说是林立果身边的一位英文翻译。两位女兵在18到20岁，身材高挑，眉清目秀，身上那套空军军装显得有些肥大。两位姑娘一点也没有女孩子扎堆儿时说笑打闹的活跃样子，她们的出现说明没有同林立果、刘沛丰一起到北戴河林彪的住处。

吃完饭，大家回到招待所各自按照分配好的房间休息。潘景寅是师一级的干部，被安排在单独的高干房间里，服务员小魏同两个女兵安排在同一间客房里，剩下的7个人被安排在另一栋基本连在一起的平房里。这栋平房呈东西走向，最东边的一间是专机师调度室主任老李常住的房间，第二间住的是程洪珍，从第三间开始由机组分配。我就按照机组人员的特点，结合平时住宿的习惯分配了住房。机组的3位机务人员在第三间，我与领航员住第四间，第五间是团司令部的两位老陈。

机组成员各就各位。大家从下午6点一直忙到晚上10点，也有点累了。此时，我站在门口问隔壁的副驾驶员陈联炳：

“现在休息如何？”

“潘不来，咱就睡。”

其实，我知道按任务规定程序，我们还有一个机组会没有开。我想，当天只飞行了短短的几十分钟，没有什么要说的，机组讲评会不开也罢。

过了几分钟，潘景寅来到平房，要开机组会。于是，大家很快聚集在3个机械师的房间，屋里3张床坐9个人显得满满的。开始，潘景寅把北京到山海关一段飞行情况作了简要的讲评。接着说：“现在两条路线斗争很复杂，要解决跟人的问题。”潘说的“两条路线斗争”是指当时在空军部分单位中纷纷传扬的“吴反林”，即空军司令员吴法宪等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副主席”的流言。

关于第二天的飞行，潘说：“明天的航线到什么地方还不知道，我们听空军胡副参谋长的指挥就行了。”机组最关心的就是飞向哪里，只有知道了航线才能对天气、地形、备降场等做到心中有数。现在还不知道航线，那么明天飞行时航线沿途的地面保障怎么办？对此，潘回答：“关于航线保证，空军司令部航行局会及时安排的。”

机组会上，机械师李平汇报了飞行后检查飞机状况良好及飞机上还有12吨半油料的情况，服务员小魏主动检讨在北京起飞时没有固定好茶具打坏了几只杯子的事。

关于第二天的时间安排，潘景寅说：“明天6点起床，6点半吃饭，然后早些到机场准备飞机。现在时间不早了，抓紧休息。”我看一看手表，时间指在22点40分。

隔壁的3位机械师，因比较疲劳，很快就关门睡觉了。

初秋的海边，夜深风凉，我就睡在靠近窗户的床上，窗口和门是紧靠在一起的，窗口离机械师们的房间不到1米远。我将开着的窗户关上并拉上窗帘。也许就是这个下意识的极其普通的动作，把我们同机械师分到了两个世界里，仅一墙之隔，竟没有听到机械师们起床时的任何一点动静。

入睡之前，我还问同屋的领航员老李：“你们不是在飞机上研究航线了吗？”

“只是估计了几条航线，有重庆、大连、广州等，没有说准到什么地方去。反正我的领航记录纸都已经备份好了。”领航记录纸上面可以提前填写好所飞航线的基本数据，实际情况要在空中才能填写，领航记录纸可以提前准备好。

山海关机场9月12日深夜的11点钟，表面看来十分安静，我带着一天的疲劳很快进入梦乡。

#### ◇ 惊心动魄的山海关之夜

“嘭嘭嘭！嘭嘭嘭！”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把我从睡梦中惊醒，门外急呼：“首长到机场了！快起床！”接着又听到敲击隔壁房门的声音。我听出是调度室主任老李在叫门。领航员老李也同时被急促的敲门声惊醒。黑暗中我摸到了开灯的拉绳，电灯打开，看到老李和我做着同样的动作，彼此顾不上说话，想的和做的只有一个字：“快！”我们都拿出了平时紧急任务时练就的硬功夫，以最快的速度穿上衣服。以往虽然碰到许多紧急情况，但从未有过首长已经到达机场而机组人员还在睡觉的先例，况且，这次又不是一般的专机任务。当我穿第二只皮鞋的时候，突然听到从停机坪传来飞机发动机起动的声音：

“轰……”

“怎么会……”我脑子里刚刚闪过“机组还没到场，飞机怎么会开车的疑问”，但马上又被这真切的非常熟悉的三叉戟发动机的轰鸣声否决了。没错，这肯定是256飞机发动机的开车声。我顾不得系好鞋带，也没有扣好衣扣，提上提包冲出房间。黑暗中，借着招待所外面微弱的灯光，我看到副驾驶和通讯员2人已经跑在了我们前面。当我出门向左转跑步经过机械师、程洪珍、调度室3个房间门口时，也没有顾得上向他们的房间看上一眼，但眼睛的余光中，隐隐约约觉得程洪珍的房门口站着一个人。我继续向东跑，当从右前方看到停机坪时，只见停机坪白炽灯下银白色的256飞机，随着突然增大的发动机的轰鸣声，快速向前弹了出去。此刻，这是个无法让人理解的局面，是我飞行以来没有见过、也没有听说过的局面，这就是机组中起码还有4个人没有上飞机，飞机竟然要飞走。我顾不得细想，只是以最快的速度跑到停机坪，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在飞机发动机的轰鸣中，停机坪呈现一片混乱。在白炽灯的强光下，我看到256飞机正沿着通往跑道东头的滑行道快速移动，发动机的声音在深夜显得格外大，盖住了停机坪上的一切声音。海军地面保障人员和刚跑到机组人员，不约而同地望着离去的飞机，惊呆了在那里，紧张得说不出一句话来。

混乱中，我发现一队人马突然从黑暗中出现，一辆卡车满载着全副武装的陆军战士在停机坪中央停住，有的人已经端着步枪从车上跳下，我似乎听到有人喊：“开枪！”又有人喊：“不准开枪！”人们的喊声、汽车发动机声、飞机的轰鸣声混在一起。在那辆卡车到达的同时，一辆吉



普车出现在离我几米远的地方。只听一声刹车，随即从车上敏捷地跳下一位40多岁的陆军军官，他看我上身穿飞行员工作服，认定我就是机组人员，用左手拉住我的右臂，右手拿着手枪，一边用手枪点着远处正在滑行的飞机，一边操着浓重的山东口音，非常着急地对我说：

“你、你……快把飞机拦住！”

我连谁在飞机上都不知道，赤手空拳站在那里，怎么能把飞机拦住？那位军官也是急不择言。我连问数句：

“谁在飞机上？”

“这架飞机不能起飞！你把它拦住！”他答非所问，好像根本没有听懂我的问话。我脑子里综合各种奇特现象，迅速得出结论：无论如何，肯定是有问题，只要飞机不起飞就会弄清楚。我看到停在那里的吉普车，急中生智，用手指着那辆吉普车反过来“命令”那位军官说：

“快！快把汽车开到跑道上对正飞机，堵住它，就不敢起飞了！”

面对当时这惊心动魄的局面，我脑子里迅速闪过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有坏人劫持飞机吗？当我看到飞机突然滑出时，首先想到了这一点。因为从来没有过在机组主要人员不到位的情况下飞机开车起飞的——缺少副驾驶员、领航员、通讯员的情况下，飞机怎么能起飞呢？就是在家门口训练飞行员起飞、落地技术这一最简单的飞行科目时，也得有副驾驶员、领航员、机械师在飞机上，缺一不可，更何况这是在外场，又是夜间，又是重要专机待命之中，飞机怎么能起飞呢？还有，昨晚机组会之后大家都睡觉了，除机组之外，是谁半夜三更爬上飞机的呢？那一定是坏人所为。然而，我又想，三叉戟飞机刚从国外引进两年，除了眼前这几个飞行员，谁还会驾驶呢？不可能，我否认了自己的想法。当时我的全部思维都是集中在正常的飞行活动范围之内，不敢想也不可能想到把眼前的情况同政治事件联系在一起。

第二，调度室主任敲门时说，“首长到了，快起床！”然而，停机坪的混乱场面，哪里有一丝一毫首长乘坐飞机时的气势呢？我虽然没有执行过林彪的专机任务，可是，在执行别的专机任务时，都是机组很早把飞机准备好等候首长的到来。首长来之前，先遣人员总是忙上忙下往飞机上搬东西，欢送的人也都先期到达机场候机室等候。首长未到已经是人来人往，车水马龙，热闹非凡；首长一到，更是小车成串，迎送的人成片。就是紧急任务或秘密任务也是紧张有序，忙而不乱。在招待所里急忙穿衣服时，我还想着是首长的紧急任务，然而一到停机坪，脑子里所谓“首长专机”的概念早就飞到九霄云外去了，根本想不到会是林彪在飞机上。

第三，停机坪上飞机强行滑出，后面军队尾追，全副武装，荷枪实弹，带队军官心急如焚，战士持枪喊声不断，我几次问他谁在飞机上，他都不说。可以肯定，这不是一般的问题。现在时间不允许犹豫下去，只要飞机不升空，问题总会弄清。

以上这些想法在脑子里一闪而过。当那位军官登上吉普车的时候，飞机已经滑入跑道的东头，机头已经调转过来对正起飞方向，从停机坪望去，可以清楚地看到飞机的右侧面。随着飞机就要起飞，大家激烈跳动的心好像要蹦了出来。果然，最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飞机开始增速滑跑，几十秒钟后，便冲天而起消失在机场西南方的夜空，和我一样呆站在那里满脸都是问号的领航员，没有忘记他的职业习惯，低头看了一下手表，当时的时间是1971年9月13日零时32分。这个时刻被永远地记入了史册。

◇ 带着血与泪的算式： $9 - 4 = 5$

飞机强行起飞后，随着发动机声音的消失，停机坪突然变得十分宁静，甚至静得令人感觉恐怖。在场的专机地面保证人员、8341部队林彪警卫团的指战员及专机机组的部分人员，在这短暂的时刻里，谁都不知说什么好，陷入一种不可思议也无法理解的迷茫之中。然而，最困惑的就是我们机组中未登机的成员，脑海里似乎有多个问号需要马上得到解决：

“机组谁在飞机上？”

“除机组之外还有谁在飞机上？”

“飞机为什么会突然起飞？”

我急于知道这3个问题，更想知道第一个问题。我顾不得叫上另3名机组人员，转身径直朝临时飞行调度室走去，因为是调度室主任老李叫我们起床的，他一定知道谁在飞机上。半路上碰到机组空中服务员小魏姑娘，她手提两个暖水壶和随身用品，正急忙向停机坪走去，一看就知道她的动作比我们慢了许多。虽情况紧急，但她恪守本职，没有忘记给首长打开水喝。她已经听到了飞机起飞的声音，见到我后第一句话就问：“飞机怎么起飞了！我的开水还没有打呢！”显然，她的想法还停留在正常专机任务上。

我被突发事件弄得心烦意乱，没好气地回答：“都不知出了什么大事情了，怎么还想着打开水！”我接过她手中的水壶，一同奔向调度室。调度室的门一直开着，屋里的灯光射向门外。

刚到门口，我还没进门，劈头就问：

“谁在飞机上？”

“潘景寅和3个机械师。”调度室主任揭开了我的第一个谜。

我没等调度室主任老李把话说完，就和小魏扭头朝塔楼快步走去。其实，老李也晕头转向，急得在房间里团团转。飞行员的职业本能告诉我，只有到海军调度室才能知道飞机起飞后的情况。

山海关机场调度室成了追寻三叉戟256行踪的指挥中心。调度塔楼位于停机坪东北方向约30米的地方，塔高20多米，站在这里可以对平坦空旷的机场全貌一览无余。可是，因为是在午夜，外面一团漆黑，什么也看不见。

当我们跑到塔楼跟前时，看到8341部队林彪警卫团的指战员们已经将调度室团团围住。他们个个荷枪实弹，严阵以待，在昏暗的夜色里，也能看出他们临战时的严肃表情。调度室的塔楼里同样充满了指挥战斗的气氛。标图员头戴耳机手拿画笔俯在标图桌上头也不抬地勾画着；海军场站的领导持话筒不停地呼叫256飞机的代号；林彪警卫团的领导急于接通北京的电话，他们要向中央保卫局汇报北戴河发生的紧急事变。在塔楼的顶层，形成了由陆、海、空三兵种组成的临时指挥部，一个特殊的指挥部。

然而，时间一秒一分地过去了，音箱里连一点杂音都没有。机组和在场所有的人，多么盼望能听到潘景寅的声音，哪怕是一句话、一个字、甚至按一下驾驶杆上的发话按钮，音箱里总可以听到一点动静。寂静中，似乎每个人都能听到自己心脏在激烈地跳动。

此刻，空军各级指挥部门都已闻风而动，专机师指挥所的人们在紧张地忙碌着，人民大会

堂、党中央、周恩来总理也处在紧张的指挥之中。山海关机场小小调度室紧紧连着三军总部，也牵动着共和国的中枢神经。

未能飞走的机组人员5双眼睛紧盯着雷达标图员手中的画笔，焦急地观察着飞机飞行动向。海军雷达标图员头戴耳机手握红色画笔，整个上身俯在圆形的标图桌上，标图桌玻璃版的下面就是小比例的、以山海关机场为中心的雷达监控地图。

电台联系不上，也只有从雷达的屏幕上得到256飞机的信息。标图员将雷达传过来的高度、方位、飞行速度等数据，标在紧贴地图的玻璃版上，红色的画笔终于在地图上画出一条很不规则的弧形轨迹。我们迫切要得知这一轨迹的去向，然而标图员紧握画笔的手不动了，他的身体慢慢站直，并从头上去掉耳机，很镇静也很职业地说：“雷达员报告，256飞机的信号从雷达屏幕上消失了。”此时，离起飞14分钟。

标图没有了，可我的视线仍然停留在圆桌上，两只眼睛呆滞地在那里发愣，刚才标图员画出的转弯轨迹，像一条僵死的蚯蚓一动不动地爬卧在那里，十几分钟之前所发生的一切，似乎都聚焦在这条不规则的飞行轨迹上面，深深地刻印在我的脑海里。

已经无法继续获得三叉戟256飞机信息，大家从塔楼上下来，直奔招待所调度室主任的房间，在那里可以了解到飞机起飞之前发生的事情。这里又成了没有人专门组织的陆海空三军都有的临时会议室。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说了起来，不同单位的人怀着共同的心情谈论着刚才发生的突然事变。

突然，门外冲进一位陆军军官，只见他在房间的中央成半蹲的姿势，手拿着几支“五九式”小手枪，用很熟练的动作退出已经压在枪膛里边的子弹。这些手枪就是从程洪珍等3人身上搜出来的。原来我们跑向机场的时候，程洪珍就站在宿舍的门口，两支子弹上膛的手枪已经插在腰间。

陆军从山海关机场撤离之后，又恢复了宁静，然而机组人员的心情却无论如何也平静不下来。我们5个人不约而同来到机械师们的房间，面对3张空床，人去屋空，内心有着说不出的滋味，满脑子的困惑。有两床被子是经过简单整理胡乱叠起来的，有一床被子没有整理，伸手一摸余温尚在。当时离机械师起床还不足50分钟。9月份，秋季沿海的后半夜凉气逼人，身穿夏季布工作服的我，望着窗外空旷漆黑夜空，面对人去屋空的景况，不由得打了一个寒战。

主管机械师李平，35岁，个子不高，身体粗壮，行动敏捷，性格豁达开朗，曾维护许多机种，技术精湛，是三叉戟飞机中不多的空勤机械师之一。他满腔的工作热情，使人总觉得在他身上有一种用不完的劲。李平的家在天津，还没有条件把家安置在北京，好在天津离北京不远，大的节假日如果没有专机任务，就可以乘火车回家看看。他的第三个孩子刚出生不久。

机械师张延奎，26岁，是维护飞机的一把好手，性格沉稳，寡言少语，对他来说，平时默默无闻地埋头工作也许更能代替有声的语言，他与机械师李平密切配合，出色地完成许多重要专机任务。他刚结婚不久，爱人就在北京市内工作，已经有孕在身，繁忙的专机任务使他没有更多的时间去享受二人世界的甜蜜生活。

特设师郇起良，36岁，老家东北长春人。身材高挑，精明强干，毕业于长春空军地勤学校，在维护飞机的各种特殊设备方面，属科班出身，不但动手能力强，有着丰富的实践工作经验，而且理论造诣也很深。三叉戟飞机特种设备复杂，专机任务非他莫属。他有两个女儿，爱人身体不好，患有慢性病。

潘景寅，42岁，出生在河北省丰润县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母亲去世早，是姑妈将他带大的。17岁的时候，解放军四野的部队从村里经过，他扔下为地主放牛的鞭子跟部队走了，后来被选拔为空军航校第七期飞行学员。他执行过很多重要专机任务，人所共知的武汉“七二〇”事件中，就是他驾驶伊尔-18飞机将毛泽东主席从武汉送到上海的。在改装三叉戟飞机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又用伊尔-18飞机执行了宋庆龄专机的任务。

“他们飞到哪里去了？”大家都在想着同一个问题。每个人都不止一次地看手表，时间1秒1分、5分、10分、半个小时、1个小时过去了。大家很少说话，也不知道说什么好。这无声的语言只用两个字就可以概括，那就是“油量”。这两个字谁都没说出来，飞机上的油料给它的飞行时间却只有两个小时，也就是说，飞机在13日凌晨3点以前必须降落。这就是机组5个人守在3位机械师住过的房间不停地看表的原因。

#### ◇ 机组人员的走留是如何安排的

机组人员的走留，是个至今也没有完全解开的谜。

有一点可以肯定，机组9人有走有留，是机长潘景寅直接造成的。问题是，是潘景寅自己主动安排的，还是有人授意他这样做的呢？从各种迹象分析，潘景寅是在别人的授意之后主动安排的，向他授意的人就是林立果。在当时那个历史条件下，潘景寅自己怎么也不可能想到，是自己为自己安排了一条通往死亡的路。

“九一三”事件时的山海关之夜，表面上看，专机任务的活动似乎在正常进行，可背地里一切全变了。在离山海关机场不远的北戴河林彪住处，正在酝酿着一个特大的阴谋，形势瞬息万变。

我于9月7日用三叉戟252飞机将林立衡送到北戴河，12日晚当她看到其弟林立果后，马上意识到有飞机已到山海关。在此关键的时刻，她将林彪要动的信息通过林彪警卫团的领导及时报告了中央，周恩来总理打电话给叶群，追查三叉戟飞机已到山海关的事情。林彪等人意识到阴谋败露，南逃广州另立中央不成，于是，破釜沉舟，北逃叛国。

林立果等人一旦决定北逃，最担心的就是飞机的准备情况及9个人的机组。如果按原计划飞往广州，因为是国内飞行，仍可以用“重要专机”的招牌欺骗下去，但是改为北逃后，再用“林副统帅”的光环继续蒙骗下去是不可能了。做贼者心虚。林立果、刘沛丰在空军多年，他们深知飞行员们的政治敏感性，一旦飞机升空，那航向会一下子将他们的叛逃的面目彻底暴露，到那时，面对9个人的机组，在空中他们是没有把握控制局面的。所以，他们通过电话通知在山海关机场的潘景寅：马上把飞机准备好，机组人员越少越好。

当晚，潘景寅除了开机组会之外，基本上就呆在调度室主任的房间，除了接听电话外，就和同机到山海关的程洪珍聊天。调度室主任的桌子上放了3部电话机，其中一部是红色的，一部是山海关机场内部的，按规定，红机电话是直接与重要人物联系的。

午夜，时间刚跨入9月13日，潘景寅接到一个电话后，马上让调度室主任通知海军场站要加油车。零时零5分，潘景寅走出调度室，把3位机械师叫起床，向他们交代了什么已无法证明，但根据种种迹象表明，机长潘景寅向机械师们交代了以下内容：

一、加油。潘会把需要加的油量告诉机械师，这是飞行业务活动中正常的职责划分，即使

潘不交代，机械师也会主动请示潘景寅的。

二、将飞机准备好，处于起飞待命状态，越快越好。从3位机械师起床时动作仓促情况看，且他们随身携带的洗漱用具也不在了，更说明是要做起飞前的准备。

三、“你们先上机场，我同机组其他人员研究一下航线，随后就到。”原话不一定如此，但潘景寅的目的是很明确的，那就是不能惊动机组其他人。如果潘不这样做，机械师们起床后会很自然地敲响我们的门，平时早上起床互相叫门几乎就是习惯。潘没有同机械师一起上机场，又一声不响地回到了调度室主任老李的房间。老李并不知道潘只是把3位机械师叫起上了机场，而机组的其他人还在睡觉，否则他也会向潘提出疑问，或自己亲自出来把我们叫醒。

3位机械师到机场后，看到油车还没有来，就利用这点时间，拔掉飞机上的所有堵塞、堵盖、插销、布套，拿掉所有活动舵面上的夹板及两台发动机上的蒙布。在此过程中，机械师李平看到油车已停在飞机右机翼前方，就急忙过去留存油样后准备加油。

从机械师起床到此时，又有十几分钟过去了，机组其他人还没有到场，这个时间差已经引起了机械师们的注意。这个疑问对机械师们来说，只能从潘景寅那里得到答案，奇怪的是此时还没有见到机长潘景寅的影子。

此时的潘景寅还在调度室主任的房间。在这段时间里，他完全可以把机组的其他5个人全部叫起床。他自己不但不主动叫机组起床，而且，还要阻止别人有可能把机组叫醒。他守着3部电话，也守着那位调度室主任，防止机械师通过电话叫我们起来。根据北戴河林彪住处到机场的距离（约40公里）推断，当潘景寅接电话要油车时，林彪等人已经从北戴河出发，在这段固定的时间里，潘景寅巧妙地策划着机组走留的分解局面，做得那样精心、准确，滴水不漏。

我和领航员与机械师们住的房间只有一墙之隔，我是个睡觉很轻的人，房间开着灯就不能入睡，可是，3位机械师起床时，竟没有听到任何一点声音。

山海关专机警卫及地面保障人员眼看着3个忙碌得不可开交的机械师，就是帮不上手。当看到油车到场，机械师中的一个人爬到机翼上准备加油的时候，突然，一辆黑色红旗牌轿车从停机坪外的黑暗中急驶而来，“嘎”的一声急刹车，在飞机的左后方停了下来。此时是零点22分。第一个从车上下下来的是叶群，身穿衬衣，一下车就大喊：

“有人要害林副主席，快让油车离开，我们要走！”并高呼：“誓死捍卫林副统帅！”

第二个下车的是林彪。最后一个下车的是林立果，他手里端着枪。飞机舱门处没有大登机梯，只有一个随机携带能够折叠的便梯。林彪就是在上拉下推的情况下爬上飞机的。

潘景寅是在听到招待所外面的汽车声音时匆忙离开调度室的。潘景寅到达机场后，径直登上飞机。因为从宿舍到机场停机坪只有百余米，很快就到。此时的特设师郅起良看到首长已到，机组还有一多半没来，就撂下手中的工作，急忙拿起飞机左前方停机坪旁边的场内电话，要通调度室，急促地喊：

“首长到了，机组怎么还没来！”此时，调度室主任老李也为郅起良的电话吃了一惊，方才知机组并未全部到场，等他跑出门外，急促地敲响我们的门，该发生的事情已经发生了。

此刻，山海关场站佟参谋长已经接到不准256飞机起飞的命令，并从海军调度室奔向2

56 飞机，准备把不准起飞的命令向机长传达时，在飞机旁边没有看到潘景寅，却看到正在打电话的邵起良，于是，就将不准起飞的命令告诉了邵起良。这时，参谋长看到邵起良紧皱眉头，焦急万分，竟愣愣地呆站在那里，不知如何是好。这时，林立果大步跨到电话机旁，督促邵起良快上飞机。邵起良边走边回首翘望，他多么期望机组的人能马上出现。林立果一手持枪，最后一个登上飞机。已经登上飞机的叶群等人，还把头伸出驾驶舱的窗外，命令停在右机翼前面的油车马上离开。接着发生的就是我跑向停机坪时所看到的那一幕。

在油车还没有完全离开的情况下，飞机急于滑出，右机翼的端部挂在了油车顶部的把柄上，右机翼尖上的红色航行灯被挂坏，部分灯罩碎片洒落在停机坪上。

从现象看，飞机强行滑出时机组余下的 4 个人是提着裤子追出来的，没有来得及上飞机，但实质上是潘景寅精心策划与安排，有意把我们给丢下的。如果没有邵起良的电话，我们还在睡梦中，除非飞机发动机的声音把我们吵醒。

机长潘景寅设计并导演了“九一三”之夜山海关机场这一幕活剧，在共和国专机史上留下了难忘的一页。他在“林副统帅重要专机任务”光环的笼罩下，关键的时候挺身而出，单人驾机升空，用自己的行为去捍卫林副统帅，把自己送上了绝路，成了牺牲品。

后来，上级有关部门在核对人数时曾反复问我们：“机组究竟有多少人？走了几个？还剩几个？”这是个既简单又严肃的问题。后来才知道，有关部门在核对温都尔汗坠机现场那 9 具尸体的时候，由于一时难以弄清林彪座车司机的身份，急于在机组活着的人身上寻找答案。机组从北京飞山海关时一共 9 个人，林彪座机起飞之后，留下 4 男 1 女 5 个人，这个只有一位数的算术题，连学龄前的孩子都不会算错。

1980 年年底，根据邓小平接见外宾时的一句话精神，经过潘景寅家人一年的奔波，争取到给机组 4 位遇难者定性为“随飞机坠毁死亡”的结论，不算烈士，也不是叛徒。林彪事件 10 年之后，总算可以告慰长眠于异国他乡荒原下的 4 位战友。

□ 《文史精华》 2006 年第 11 期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丁凯文（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             |          |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